

南洋新女性 悄凌与《南洋商报》妇女版

林春美

博特拉大学外文系副教授

李蕙名

博特拉大学中文文学硕士生

内容摘要：

马来西亚、新加坡建国之后，报章新闻报道在取材、重心与倾向上出现显著之变异。相较之下，副刊之本土化，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本文以二十世纪八〇年代末至九〇年代初《南洋商报》妇女版为讨论对象，论述主编悄凌的编辑策略如何一方面建构了妇女版之“南洋”，一方面亦打造了“新女性”的形象。

关键词：

悄凌，妇女版，《南洋商报》，《新妇女》，《南洋女性》

一、前言

在马华报业史上，妇女副刊——或今天更为读者所熟悉的名称：妇女版——的出现，不比文艺副刊晚多少。据知，开风气之先、最早刊登马华白话文学作品的《新国民日报》，在1925年初亦即已开辟本地华文报纸的第一个妇女版《妇女世界》。¹其后在其他报纸定期或不定期冒现的妇女版，虽不能说如雨后春笋，然亦可算小有收成。

纵观早期妇女版，其创刊宗旨大致不离以下几项：为妇女提供发声之管道、让社会更为关注妇女问题、为妇女指引康庄大道。这几项宗旨从积极的角度言之固然十分正面，然而却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其一，绝大多数妇女版对妇女课题的关注，仅以中国国内情况为中心，而缺乏对本地现实有所关照。即使是讨论诸如妇女职业之类极可能因地而异的课题，也无有例外。²其二，妇女虽被赋予发言的机会，但她们同时亦被预设作为智识较为低下匮乏的群体。“康庄大道”往往由掌握媒体/言论权力的男性所指导，而妇女仅是被教育的对象，而非主体存在。

¹ 林少芬：《二十世纪初期新加坡的华人妇女问题》，转引自李琼君：《经济不景气时期（1930-1934）新马华文报章的妇女副刊研究》，荣誉学士学位毕业论文，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1995-96。

² 有关早期妇女版的创刊宗旨与关怀重点，可参考转引自李琼君《经济不景气时期（1930-1934）新马华文报章的妇女副刊研究》，与廖慧敏同年论文《战前时期新马华文报章妇女副刊研究（1937-1942）》。

马、新中国之后，报章新闻报道在其取材、重心与倾向上出现显著之变异；相较之下，副刊之本土化，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一位副刊编辑曾以其自身经验指出，因报馆实施“多用剪刀，少付稿费”政策使然，迟至八〇年代中，本地副刊大概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文章都是转载的。³这种情况在妇女版亦然。

因此，“南洋”女性，而且是“新”女性，大约得等到八〇末悄凌执掌《南洋商报》妇女版之后，才以令人惊艳的姿态，横空出世。

二、新女性者悄凌

悄凌（1949-）在主编《南洋商报》妇女版之前，曾先后担任过文学杂志《学生周报》、《蕉风》，与女性杂志《风采》、《新潮》的主编。她最初担任编辑工作是在1968年，1988年加盟《南洋商报》之前则是《通报》的副刊主任。整整二十年的编辑经验为她累积了雄厚的文化资本，使她一方面既能通于雅，另一方面又可入于俗。

悄凌接编《南洋商报》妇女版，大约始于1988年4月。

³ 详阅张永修：《副刊本土化之实践：以我编的“星云”及“南洋文艺”为例》，《人文杂志》第17期，2002.12，第91-95页。

她接手之后，妇女版虽沿用旧称《新妇女》，但编辑概念已出现明显变化，版位亦从之前的半版扩大到每日一版（周一至周六出刊），有时甚至也增加至一版半。1990年7月份开始，除固定的日刊外，妇女版逢周四亦增设《南洋女性双周刊》。双周刊扩大了妇女版的篇幅，其中本地作者所写的专栏文章也跟着增加。1991年3月，随着副刊改革，双周刊取消，《新妇女》易名为《南洋女性》，从周一至周六每日以特定主题形式见报：星期一为“两性接触”，主要谈论两性相关课题；星期二为“职场传真”，以专访职业妇女、报导她们的心声为主；星期三为“飞越青春”，主要讨论青少年关注的课题；星期四为“潮流传奇”，报导潮流事宜；星期五为“男腔女调”，特邀本地男女作家撰写专栏，堪称妇女版中的文艺版；星期六为“安全地带”，专门探讨与育儿及家庭相关课题。此模式其后沿用多年。

《新妇女》在悄凌主事之前是港台剪报的天下，与建国前妇女版以中国为中心异曲而同工。悄凌执编之后，一改转载港台的编辑策略，大量吸取本地资源，以专访、座谈、专题报道、特邀专栏等形式开拓妇女课题领域，不仅使内容更为丰富多采，其大刀阔斧的改革，亦迅速完成妇女版在取材方面的本土化转向。而对于一个以女性为阅读对象的副刊而言，编辑悄凌更重要的贡献，可能还在于她通过上述诸种形式，对女性性别角色，甚至其主体性，所作出的思考与审视。

（一）反思女性“天职”

传统社会主张“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表面上对成年男女的终身大事有同样的期待，实际上却对没有完成妻职者怀有更大的歧视与敌意。即使到了八〇年代，适龄而未婚的单身女子依然饱受“老处女”、“老姑婆”之类的外号的羞辱。情凌接编《新妇女》不久，即以整版的醒目版位，揭示单身女性的内心世界，挑战传统观念。受访的女性未必抗拒婚姻，然而却充分享受单身生活。有者表示，“每次我下班回来，翘起脚躺在沙发上，我设想我那些结了婚、有了家庭的朋友、同事，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这会儿正在洗尿片、洗奶瓶，忙着为一家子五六口煮晚饭、洗碗碟，我感到我实在太写意了！”⁴有者认为，“已婚女性发展母性，完成母亲职责；单身女子，则发展个性，完成事业，也是把整个生命投入社会中的，已婚与未婚，投身的对象不同，各有服务的对象，人生目标，一样明确。”⁵有者尽管憧憬婚姻，但不愿马虎选就结婚对象，而更乐意在精挑细选的当儿，享受自由自在、无后顾之忧的“一人做事一人当”的生活。⁶这些专访文章无论展示单身女子的坚强自信，抑或透露她们真实的忧

⁴《陈蝶：此时不关风与月》，《南洋商报·新妇女》，1988.8.16。

⁵《杨淑莲：天下第二快乐的人》，《南洋商报·新妇女》，1988.8.16。

⁶《陈润芬：一人做事一人当》，《南洋商报·新妇女》，1988.8.16。

虑与所面对的压力，其旨趣都可归结到编辑所打的主标题：“我要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想一想我自己……”。这个非常口语化的标题中的“我自己”，应该被视为“新妇女”日常、大写的主题。

作为妇女版主编，悄凌对婚姻中女性的处境自是多有关注，她所主催的多场座谈会，比如谈婚姻是否该包含爱情以外的考量因素的《加料婚姻》⁷、讨论妻子如何因应丈夫夜归问题的《望窗的女人》⁸等，皆是对此类课题的探讨。正如她主张现代女性的妻职应该以“想一想我自己”为前提一样，她对婚姻中女性不得不“去妻职”亦持正面态度。在一项座谈会中，论及婚姻破裂的相关课题，即有过来人现身说法，表示选择离异的女性“开步走第一步无疑须要勇气，但将个人的命运操在自己手中是绝对必须的”。这个说法显然获得其他与谈者支持，一社团妇女组负责人据相关经验指出，离婚后尽管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但结束婚姻危机却赋予女性新的开始与希望，有者甚至可以“重新调整生活起死回生”。而针对此议题更尖锐而触动人心的言论，可能还是以数倍大于内文的粗黑体标示的编者引言：“不要以守门员心态守住破碎婚姻，因为并非每个女人都有反败为胜的能力！”⁹

⁷ 《加料婚姻》，《南洋商报·新妇女》，1988.11.29。

⁸ 《望窗的女人》，《南洋商报·新妇女》，1988.9.28。

⁹ 《眼镜岂可再跌·新生的喜悦》，《南洋商报·新妇女》，1989.3.8。

尽管悄凌在思考女性妻职方面显得前卫，她对传统女性的母职却一点也不妥协——“人间没有变色康乃馨”，一项配合母亲节而办的座谈会标题已充分显示此点。在这项座谈会中，悄凌虽引刘晓庆所言“天下只有结不了的婚，没有离不了的婚”，然却显然对其“潇洒”颇不以为然。其后的发言亦多是引导与谈者往父母离异之后孩子的处境设想。¹⁰在其任内亦办了不少与此相关的座谈，比如讨论现代母亲的责任的《及时的一针胜过九针！·从学校的纪律风波谈起》¹¹、探讨母亲如何教育青春期女儿的《青春女儿VS更年期母亲》¹²、从十位少年眼里看妈妈的形象《我的妈！》¹³等。

母职不可轻易卸下，然而女性的自我价值与潜能亦不能为父权家庭中没完没了的繁琐家务所埋没。悄凌所办座谈会“儿童有幼稚园，青少年有学校，而妇女，没有一个属于她们的天地”表示关注，提醒妇女勿被婚姻之墙阻隔自我与外在广阔的世界，主张婚姻中的女人当自强，应积极寻找

¹⁰ 《不一样的母亲一样的心·人间没有变色康乃馨》，《南洋商报·新妇女》，1989.5.14。

¹¹ 《及时的一针胜过九针！·从学校的纪律风波谈起》，《南洋商报·新妇女》，1988.6.15。

¹² 《亲情战争·青春女儿VS更年期母亲》，《南洋商报·新妇女》，1990.5.11。

¹³ 《我的妈！》，《南洋商报·南洋女性》，1991.5.10。

自我提升的机会。¹⁴此外，《新妇女》也通过专访及其他形式多方报导成功挣脱命运摆布的女性故事，对妇女主体意识的建构起着积极意义。受访者中，有些从家庭主妇蜕变成画家，有些则虽为家庭主妇却懂得争取空闲时间学习手艺，有些靠后天的好学精神成功挣脱文盲的命运等。类似的报导反映了妇女通过自我提升，因而得以对被设置好的命运做出改变的可能。

（二）展示“玉手”实力

经济独立、不仰赖他人之供养，是女性获得自主与尊严的先决条件。悄凌主编妇女版期间，对女性的经济问题十分关注。在接编之初，她即配合五一劳动节制作特辑，专访五位劳动妇女。这些分别从事小贩、胶工、泥水、和派报等方面的工作的女性，做着一般可能为男性更能胜任的体力粗活，可是却不畏辛苦，既主内又主外，努力追求自身的经济独立。¹⁵较后，她又借助本地学者宋婉莹的田野调查，将到城市打拼的乡村妇女的经济困境、及因新经济政策重组聚居乡村（regroupment）而在生活线上搏斗的女性的命运这类较为严肃的课题，¹⁶呈现在妇女版读者的眼前。

¹⁴ 《眼镜岂可再跌·新生的喜悦》，《南洋商报·新妇女》，1989.3.8。

¹⁵ 《汗珠比泪水更晶莹》，《南洋商报·新妇女》，1988.4.27。

¹⁶ 分别见《我是一朵向日葵·乡女离乡记》与《生活线上洒汗珠》，《南洋商报·新妇女》，1988.11.9，1989.2.21。

1990年中，随着《南洋女性双周刊》的出刊，悄凌推出“玉手起家”系列。这个逢双周见报的系列，维持约半年之久，集中访问许多女性创业者，强调她们将自己的兴趣与技巧转化为事业/生意的历程与理念。这些女性有的是家庭主妇，可是却不被家务捆死，而将自己作为巧妇的才艺转换为家庭经济的可观来源。比如因见附近中学生经常为三餐烦恼而盟起包伙食服务念头的许阿姨，在经营包伙食生意后，又极具创意地把食品制成冷冻食品，因而创立了“许阿姨食品供应中心”；¹⁷又比如对百家被极感兴趣的许桂碧，最初阅读相关书籍只为打发时间，后来竟不仅钻研出缝缀技巧，还钻研出一盘生意经来。¹⁸

此外，在这个系列中出现的女性创业者还包括了假首饰店老板、美发店老板、美容院老板、花店老板、时装店老板、画苑创办人、从事陶瓷、裁缝、插画的艺术师等。尽管悄凌时期的妇女版也刊登不少诸如女性装饰、缝衣织布、美容美发、时装时尚等通俗、软性的资讯，但“玉手起家”系列在理念与编辑手法上，却显然有意将上述较为“阴性”的行业，从取悦“悦己者”的手段，转化为女性创业兴家的励志故事（如果不称之为“英雄”故事的话），为女性自立自

¹⁴ 《懒主妇救星来了》，《南洋商报·南洋女性双周刊》，1990.12.13。

¹⁵ 《祖母旧爱复活记》，《南洋商报·南洋女性双周刊》，1990.8.23。

主建立良好典范。更何况，系列名称“玉手起家”，改写自向来只用以形容成功男性的成语“白手起家”，实不无改写读者对这只坚毅有力且富传奇性的“白手”之刻板性别想像的寓意。

继“玉手起家”系列之后，俏凌另起系列“拼命阿姐”，采访一些跨国公司或大企业的总监、经理级的女性，讲述她们自修成功的故事，及个中的辛酸与乐趣。这个系列为期不长，然在系列之外，却也刊载不少人物专访文章，报导当时女性职位提升的概况，展示女性毫不逊色的领导能力。受访者包括女子精武体育会会长、银行总经理、超市总经理、酒店市场服务部总经理、雪兰莪州华人大礼堂理事等。这些文章彰显女性在现代职场上的实力，对于传统社会男强女弱的成见，或有一定的颠覆意义。

（三）修订性别角色

男女性别角色的固定化——或者说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其实光明正大地隐藏于现代体制之内，却往往被“习以为常”，而难以为人所察觉。《新妇女》记者曾对马来西亚华小广泛采用的华语教科书进行一项调查，并针对课文中出现的男性与女性的角色与人格特征等作出统计分析，发现：

男性的角色从爸爸，兄弟开始，至警察，政治人物，医生，学者，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职业层面。

而女性的角色只限制于妈妈，姐姐，老师，家庭主妇，护士，女运动员等寥寥少数。角色层面上也受到限制，尤其是突出贤妻良母，视治家顾子为妇女们的“天职”。

另一方面，这些男性的人物性格往往比女性突出和有优越感。他们是社会的领导人物，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家庭的决策者，孩子知识的启迪者，亦是勤力的知识追求者。

而女性的角色都是比较温顺的贤妻良母，她们是家务的操作者，没有学问和社会经验，也不是个学问的追求者。¹⁹

记者指出，在职业妇女已经崛起之际，教科书不但没有如实反映当前社会状况，反而持续建构“爸爸看报纸，妈妈做家务”一类守旧、落伍的天伦乐园图，无异于继续灌输孩童男优于女的不平等性别观念。这篇题为《女性的命运，写在教科书里？》的文章不仅对性别歧视作出控诉，其可贵之处更在于从教育体制层面，对普遍存在的性别角色成见之成因，作出了探讨。

若说教科书形塑孩童的思想观念，那么在电子媒体尚未崛起的时代，报纸或许就是成人的另类教科书。在教科书中，男性人物拥有的人格特质是“公正，勇敢，百折不挠，正义，坚毅，能干，胸怀大志”，而女性人物则是“友爱，

¹⁹ 《女性的命运，写在教科书里？》，《南洋商报·新妇女》，1989.8.22。

合作，慈祥，热心助人”²⁰。后者往往被视为是从阴柔的“女性气质”中自然生成，不具特别的能量；而前者，却是成功的条件。我们发现，悄凌时期的妇女版——作为“成人的另类教科书”，似乎有意修订这种既成的、刻板的性别角色观念。特别是在人物专访中，她选择的不少女性人物在职业上有“去性别化”或中性化的现象，比如健身教练、工程师、体操教练、室内设计师、配茶师、罗里运输业者等。这些女性跻身于所谓“属于男性的职业”中，却能以勇敢的精神、专业的服务态度确立威信，赢得工作伙伴的信服。比如任建筑工程师的林富佐，面对工地的困难毫不畏惧，她接受挑战爬上临时搭起的梯架子，折服了一班建筑工友，最终在工地上建起的不仅是百尺高楼，还包括自己的威信；²¹又比如表示“最重要的是能够以强烈的战斗精神来面对困难的挑战”的再娜，曾在警界服务，后来担任罗里公司主席，而且还创立了大马罗里车工会，以敢说敢言、敢做敢为的处事方式深获工会会员的信服。²²

悄凌改写性别角色成见之手，同时还几番伸入向来被视为男人的世界的政治领域。她主编期间访问过不少女性政

²⁰ 《女性的命运，写在教科书里？》，《南洋商报·新妇女》，1989.8.22。

²¹ 《百尺高楼平地起·林富佐爬楼梯服众》，《南洋商报·新妇女》，1988.8.17。

²² 《再娜“好战”有因》，《南洋商报·新妇女》，1990.8.14。

治人物，包括居銮区国会议员林水仙、青年与体育部副部长兼马华全国妇女组主席及劳勿区国会议员邓育桓、八打灵和平花园区州议员温凤玉医生、民政党妇女组总秘书梁秀容、巴生第一位华裔女市议员李月兰等。她们认为，一般妇女或因患有政治冷感、或因认为政治是肮脏的、或因还未面对真正的困境等原因，而对政治有所抗拒，更别说实际参政。然而她们提出，没人可以自外于政治，“大家都与政治有关”²³。妇女权力的低下，与妇女薄弱的政治力量有关。

“这么多年来妇女都受到压迫，如果自己不做些什么，这种压迫肯定还会继续下去。”²⁴因此，她们主张妇女必须意识到“争取妇女政治权力不是一种‘野心’，而是一种政治力量提升。”²⁵有受访者表示，自己参政“不外是希望做一个开路人，开一条路给下一代好走一些。”²⁶一如企图透过政治途径扭转女性生活逆境的这些先锋者，作为编辑的悄凌在修订性别角色成见方面所做的，大抵也是一个“开路人”的角色。

（四）引入马华女性文学

在妇女版还是港台剪报天下的年代，林燕妮、亦舒、方

²³ 《大家都与政治有关》，《南洋商报·新妇女》，1990.3.8。

²⁴ 《勇向虎山行》，《南洋商报·新妇女》，1990.3.8。

²⁵ 《邓育桓战胜敌人》，《南洋商报·新妇女》，1988.5.11。

²⁶ 《勇向虎山行》，《南洋商报·新妇女》，1990.3.8。

娥真等是其上专栏方块的常客。²⁷悄凌接编之后，港台的小块文章虽不致绝迹妇女版，但马华作家却被大量引渡至这片从不被视为文艺沃土的园地。

在悄凌主编妇女版期间，曾在该版写专栏的马华女作家人数众多，其中包括陈蝶、野蔓子、苏丽绮、爱薇、叶秋红、林惠芹、饶玉明、翠园、潘碧华、詹瑞兰、柏一、雁白、黄兼博、永乐多斯、陈玫瑰、陈小梅、陈桂蓉等。她们书写的范畴甚广——比如陈蝶既有鲜明女性主义色彩、又有人生如寄的感怀；潘碧华借古喻今，抒发感想；翠园多作对于中国陶瓷、名胜古迹以及画家的介绍；永乐多斯、饶玉明等多从生活琐事抒写对于人生的观念与想法——虽未必尽涉女性议题，但却可展示马华女性的知识层次与眼界。而在妇女版上引入如此众多女性作家的盛况，亦是前所未有的。

除女作家外，悄凌时期妇女版出现的马华男作家阵容也甚为可观，他们包括曼陀罗（张木钦）、林云龙、李国七、李天葆、李文山、范俊奇、张以欢、继程法师等。相对而言，这些男性作家书写的课题则较具针对性，多是与妇女或两性关系相关。这极可能与编者的约稿要求有关。悄凌接编《新妇女》之初曾开设每日不同关注点的“镜子系列”，

²⁷ 方娥真虽是马华作家，但其时居于香港，且刊登于《新妇女》的文章多为转载，实与剪报无异。

其中逢周一见报的“放大镜”，主要专访男性人物，意图折射男人对女人的观看，让女性读者得以“放大”端详。悄凌时期妇女版中男作家的文章之作用，亦可作如是观。其中或也有一些以男性为中心立场者，然作为供女性读者端详之对象，其作用和意义与早期以男性言论作为指引者、教育者的情况，已大不相同。

结语

悄凌可能不是掌控妇女版这个文化生产场域之权的第一位女性编辑，然而却可能是至今为止最重要的一位。她主编副刊妇女版的时间相对其他编辑而言不可谓长（大约只编至1993年），然她不仅成功在大众传媒的公共空间上建构了“南洋”“新女性”，且其所开创妇女版模式，亦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副刊风貌。其后多年，《南洋女性》无论沿用旧称抑或另立名目，大致不过萧规曹随。而若考虑到其时的妇女版在作者与一般读者群中所曾引起的热烈回响，则悄凌一手打造的“南洋新女性”，其影响之深远，可能并不是我们可以轻易衡量的。

参考文献

《汗珠比泪水更晶莹》，《南洋商报·新妇女》，
1988. 4. 27。

《邓育桓战胜敌人》，《南洋商报·新妇女》，1988. 5. 11。

《及时的一针胜过九针！·从学校的纪律风波谈起》，《南
洋商报·新妇女》，1988. 6. 15。

《陈蝶：此时不关风与》，《南洋商报·新妇女》，
1988. 8. 16。

《杨淑莲：天下第二快乐的人》，《南洋商报·新妇女》，
1988. 8. 16。

《陈润芬：一人做事一人当》，《南洋商报·新妇女》，
1988. 8. 16。

《百尺高楼平地起·林富佐爬楼梯服众》，《南洋商报·新
妇女》，1988. 8. 17。

《望窗的女人》，《南洋商报·新妇女》，1988. 9. 28。

《我是一朵向日葵·乡女离乡记》《南洋商报·新妇女》，
1988. 11. 9。

《加料婚姻》，《南洋商报·新妇女》，1988. 11. 29。

《生活线上洒汗珠》，《南洋商报·新妇女》，1989. 2.
21。

《眼镜岂可再跌·新生的喜悦》，《南洋商报·新妇女》，
1989. 3. 8。

《不一样的母亲一样的心·人间没有变色康乃馨》，《南洋
商报·新妇女》，1989. 5. 14。

《女性的命运，写在教科书里？》，《南洋商报·新妇
女》，1989. 8. 22。

《大家都与政治有关》，《南洋商报·新妇女》，1990. 3. 8。

《勇向虎山行》，《南洋商报·新妇女》，1990. 3. 8。

《亲情战争·青春女儿VS更年期母亲》，《南洋商报·新妇
女》，1990. 5. 11。

《再娜“好战”有因》，《南洋商报·新妇女》，
1990. 8. 14。

《祖母旧爱复活记》，《南洋商报·南洋女性双周刊》，
1990. 8. 23。

《懒主妇救星来了》，《南洋商报·南洋女性双周刊》，
1990. 12. 13。

《我的妈！》，《南洋商报·南洋女性》，1991. 5. 10。

李琼君：《经济不景气时期（1930-1934）新马华文报章的
妇女副刊研究》，荣誉学士学位毕业论文论文，新加坡：新
加坡国立大学，1995-96。

廖慧敏：《战前时期新马华文报章妇女副刊研究（1937-
1942）》，荣誉学士学位毕业论文论文，新加坡：新加坡国
立大学，1995-96。

张永修：《副刊本土化之实践：以我编的“星云”及“南洋
文艺”为例》，《人文杂志》第17期，2002. 12。

**New Women of Nanyang
Qiao Ling and the Women's Supplement of
*Nanyang Siang Pau***

Lim Choon Bee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Lee Wei Min

MA Candidate,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newspaper's news coverage showed a remarkable variation in terms of materials, areas and inclination of focus. In contrast, the localisation of supplement is a relatively long process.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women's edition of *Nanyang Siang Pau*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this essay discusses how the editing strategy of chief-editor Qiao Ling created the "new female" image.

Keywords

Qiao Ling, Women's Edition, Nanyang Saing Pau, New Female, Nanyang Female